

经济全球化冲击下地方文化的传承发展

—以徽文化的旅游利用与文物保护为例

(安徽大学旅游管理系, 安徽合肥 230039) 章尚正

摘要: 经济全球化冲击多元文化, 为人类提炼超越国界、反映共同智慧与追求的地球文化创造着现实条件。徽文化的复兴表明, 趋同的地球文化的建树必须以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多元存在为前提, 我们应该保护文化的持续多元共存, 让地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通过各种渠道传承发扬。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地球文化; 地方文化; 徽文化; 旅游; 文物保护; 持续多元共存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05)06-0152-05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 正是历经成千上万年无数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相摩相荡、共融互摄, 才形成卓然傲立于世的华夏文明。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称绝一时的众多地方文化, 如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徽文化等,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命运将会如何呢? 有一种意见认为, 经济全球化终将导致全球的经济一体化, 并将进而导致政治一体化与文化一体化。果真如此的话, 那么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自然只有消亡一种归宿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文试以安徽省南部徽文化为主要考察对象, 探究地方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传承与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多元性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为组织保障, 以遍布全球的信息网络为技术保障的现代经济运作态势与发展模式, 它突破以往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狭隘格局, 谋求世界各国共同建立资金、技术、人才、商品、信息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的全球性大市场, 从中获取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全球性大市场的建立以超国界的统一贸易规则为基点,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协议就反映了这种时代需求, 其重点始终放在规范和约束各成员方的政府行为, 要求他们遵循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公平竞争原则。这就必然迫使各国修订法律法规、重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改变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 对多元文化造成强劲的全面冲击。这种全面冲击, 就层次而言, 由物质文化向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深入浸润; 就范围而言, 由国家文化向地方文化扩大影响。冲击的最终成果, 不但改造了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 而且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地球文化。

先此之前, 人类文化概分为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斯拉夫—东正教文化、印度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等几大区域文化, 各类文化个性突出, 差异显著, 排斥性远远大于互容性, 摄融性大大低于对抗性。造成上述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各国、各地区缘于地理阻隔所形成的文化环境的封闭或半封闭。这种文化的封闭性表现为缺乏人员与信息的有效交流, 即所谓共存于地球而互不相知, 各自在由高山、海洋、大漠等地理屏障所围护的空间繁衍生息, 都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历史, 正是这种不同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道路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贸易的方式、相对互利的追求、席卷全球的规模谋求始于经济、成于政治、终于文化的趋同化运动。现在超越国界、超越传统文化的全球文化已初露端倪, 即以反映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与愿望、反映人类理性智慧与追求的纲领性文件而言, 文明成果就有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92年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即《21世纪议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即《世界遗产公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世界旅游组织等于1995年联

介通过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等。这些文件显示了人类对“地球村”命运的担忧与创造美好未来的努力，推动各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缔造文明。可以说，这是人类有意识、有组织地缔造全球文化的开始。这样，就最终构成了由全球文化、跨国大区域文化、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社区文化（村落文化）组成的文化结构层次。

中国从 1979 年起改革开放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跨经济全球化轨道的历程。在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与扬弃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同一步调，互相促进，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就废除或修订了 2000 多件法律法规，组织了不计其数的 WTO 知识宣讲，加快了政府职能转换与机构改革，这就从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层面推进了经济文化建设。与此相适应，地方文化也经历着分化与扬弃，下面以徽文化为例。

徽文化是古徽州文化的简称，主要是指北宋宣和三年（1121 年）改歙州为徽州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黟县）地域特色与时代特色鲜明的文化。徽文化以徽商的雄厚实力为经济基础，以封建氏族宗法制为社会基础，以儒、商二元互济为文化精神指南，其建树广及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黄山画派、徽派版画、徽派雕刻与篆刻、徽派建筑、徽派刻书、徽派盆景、新安医学、徽剧、徽菜等都曾盛极一时又流响久远。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徽文化的盛衰与徽商的盛衰共浮沉，受经济制约的属性特别鲜明：徽州僻处皖南山区，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耕地资源贫乏迫使徽州人从宋代起就走出徽州搞贩运倒卖，积数百年的经商经验与资金后，机敏地抓住明代开中盐法推行之机，垄断江淮盐务，雄踞全国盐、典、茶、木四大行业之首，崛起为中国第一商帮，长江中下游致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文化正是凭借徽商雄甲天下的经济实力而蓬勃发展起来的；随着清代道光中叶盐政废除纲法，改行票法，长江中下游又成为太平天国与清皇朝 10 余年拉锯式血战之区，再加上西方洋货大举入境，徽商就此一步步走向没落，徽文化也随之衰微，荣光不再。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冲击到了古徽州（现改名黄山市），这里除了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普遍性变化外，就文化而言，还经历着因国际旅游大发展所带来的特殊性变化。国际旅游属于世界贸易范畴中的服务贸易系列，它所带来的境内外人员流动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前驱。如果说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只有少数文物工作者知道徽文化遗存的重要性，那么 80 年代旅游大发展后，广大民众都逐渐认识到了徽文化的历史价值、旅游价值与经济价值。依托徽文化的黄山市旅游正在有声有色地推向国际旅游市场，保护与研究徽文化已经成为政府、当地居民、海内外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审视徽文化，不难发现它与其他文化一样经历着“适者生存”的扬弃，一部分成为消逝的文明，如指导古人安身立命的族规家法，维护宗族团结的祠田制度；一部分成为破碎的文明，如残存于古村落中的众多祠堂，即使修复了，也徒存古祠堂外貌，无法发挥古祠堂聚族祭祀祖先、执行家法宗规的功能；一部分成为失效的文明，如新安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之类陈腐观念；当然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融入现代文明的活性文明，如徽派雕刻与建筑艺术、徽剧徽菜、新安医学。对于徽文化的这种分裂与进化，以旅游为先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旅游对徽文化的正面效应

黄山市以黄山为龙头，以徽文化为主导吸引物，凝聚各种力量推动旅游业发展。据黄山市旅游局统计，2004 年旅游接待量达 817 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 32.56 万人次，旅游创汇 6600 万美元，旅游总收入 50 亿元，相当于 GDP 的 37.9%，提供的税收达到财政收入的 40%以上。黄山市旅游业的迅速增长，意义远远超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总量增加，对黄山市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其指向是使黄山市快速与世界全链接。考察旅游对于徽文化的效应，可以看到正负并存，以正为主。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活跃本土文化的生机，提高民族的创造力，当然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大开放背景下旅游大发展对徽文化的正面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有助于站在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科学评价徽文化遗存的突出与普遍意义，加强文物的申报与保护工作。顾晓鸣说过：“文化：以人的经验为中介。”旅游就为人们提供了“眼见为实”的难得经验。借助旅游交往与文化交流，世界人民逐渐感知并认同了徽文化；黄山人更是增强了徽文化自豪感与责任感，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竞逐世界遗产，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与财力，整修文物，治理环境，健全管理机构，落实文保经费。黄山于1990年成功登录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黟县的西递宏村也于2000年以“皖南古村落”名义登录世界文化遗产，黄山市成为少有的双世界遗产拥有市。申遗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属于文物保护工作，而申遗一旦成功，就不但提高了文物单位的保护力度，而且扩大了其在旅游市场上的招徕力，如歙县的棠樾牌坊群曾经长期被推许为徽文化的标志，1998年之前接待旅游者一直高居各徽文化景点之首，但由于主观认识不足，错过了与西递、宏村同时申遗的机会，也就失去了领先优势。而西递、宏村申遗成功后游客量大幅度飙升，如西递1999年接待17.01万人次，而2004年增至43.22万人次，增幅254.09%；宏村1999年接待4.95万人次，而2004年接待46.92万人次，增幅高达947.88%；棠樾牌坊群1999年接待12.09万人次，而2004年接待21.95万人次，增幅只有181.56%。申遗成功后的旅游经济放大功效是如此的显著，以致现在棠樾牌坊群与其他几个景点也开始策划共同申请加入“皖南古村落”世界文化遗产的扩展名单。另外，黄山市著名的三雕（木雕、石雕、砖雕）、摊戏、徽剧也启动申报世界非物质与口头遗产的工程。文物保护与申报热正在黄山市兴起，迄今，罗东舒祠、许国石坊、棠樾石牌坊群、潜口民宅、老屋阁及绿绕亭、西递村古建筑群、宏村古建筑群、渔梁坝、程氏三宅、呈坎村古建筑群这10处已经成功申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歙县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屯溪老街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黄山慈光阁、齐云山玉虚宫牌坊、北岸风雨廊桥等42处被评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引进可持续旅游发展新理念，借重世界旅游组织，编制以“文物的修复和保护”为前提的旅游发展规划，努力实现徽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双赢”。2002年世界旅游组织与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编制的《中国安徽省“两山一湖”地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颇有前瞻地指出：“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村庄正日渐被人们视作中国风俗民情和历史建筑的重要见证。鉴于此，如果得到很好的保护、改革和管理，它们将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

第三，旅游发展为文物保护积累了可观的资金。据黄山市文物普查，市域内地面文物多达5000多处，其中仅牌坊就有100多座，馆藏文物将近50000件，保存状态良好的古街镇、古村落、古巷里几十处。如此巨量的文物古迹，光靠财政拨款来保护那简直是杯水车薪，须知黄山市四县之中就有两个是贫困县，市级财政不过是“吃饭财政”，就连安徽省全年文物保护经费也只有600万元左右。借鉴世界先进文保与旅游理念，黄山人懂得了文化旅游必须依托文物古迹，只有保护好祖宗留下的文物，才有子孙后代的饭碗，所以现已开发的几十个徽文化景点都提取一定比例的旅游收入作为文物保护资金，如宏村规定每年的门票收入除去税收后，20%交黟县政府作为文物保护资金。旅游开发的光明前景还吸引来成千上万社会资金，如宏村、唐模、北岸现都由颇具经济实力的外地公司投资管理。就连尚未辟为旅游点的村庄，现在也有不少自发成立村民保护文物小组，群众自发筹资开展各种形式的保护工作。

第四，旅游发展的综合效益激发了政府与居民保护历史文物的积极性，提高了徽文化保护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创造了以动态保护为主的新文保模式。凭借黄山与徽文化为两翼，全面启动的黄山市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快速发展，黄山市短短20年就驰名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效益。据黄山市旅游局对黄山市境内21处徽文化景点（不含黄山风景区）的统计，2001年旅游人数93.38万人，次，门票收入2024.98万元；2004年旅游人数就飙升为180.04万人次，门票收入5123.50万元。上世纪70年代以前，徽州文物保护以博物馆收藏与陈列这种静态保护形式为主，现在则形成了以旅游观光、民俗参与、人居体验等动态保护为主的新模式，并且保护范围由单组建筑扩展到整个村落、再拓展到旅游区块；保护内容由物态文化遗存扩展到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拓展到徽文化整体。

毋庸讳言，旅游发展也对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破坏作用。第一，某些破坏性的旅游开发，破坏了文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如某县为了将某个景点“打造”成旅游品牌，不顾牌坊所在地百姓的反对，动用大批警力强行拆迁来数座古牌坊，就切断了这些牌坊与原村落的文化血脉联系。第二，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古村落旅游走红之后，过分的经济效益追求，造成餐馆林立，商铺满街，小贩追赶着游客兜售商品，极度的商业化与集市化，破坏了古村落的宁静与平和。第三，原居民不过千人的古村落，每年接待几十万的游客，黄金周最高日接待量竟超过五千人。如此大量游客的涌入，以及运载游客的众多车辆的进进出出，污染了大气、水体与环境，并且加快了所参观民宅、祠堂等古建筑的损坏。第四，旅游活动的金钱示范腐蚀了山乡水村老百姓的淳朴民风，如有一次欧洲游客在村头看到一位八九岁的牧童牵牛归来，觉得颇富田园牧歌式诗情画意，通过导游向牧童借牛摄影，谁知牧童递过缰绳时伸手就说：“给20元。”

三、徽文化复兴的启示

文化，特别是本土文化对经济全球化、各国现代化的作用越来越为学者重视，美国塞缪尔·亨廷顿在研究了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之后，指出“本土文化对于决定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要求政治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徽文化在三百年荣耀、百年消歇之后，借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之机，“凤凰涅槃”，扶摇直上，走向世界，成为引人注目与极具活力的地方文化之一。徽文化的复兴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首先，从文化的内在特质看，现代化了的文化，仍然是多元化的文化，地方文化一如民族文化具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先回顾中国历史，谭其骧曾经这样强调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姑且不讲全中国，即使专讲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专讲汉族地区，两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再放眼世界现实，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并未带来经济一体化：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各国固然加速突破传统区域经济的内循环，扩大国际经贸合作的外循环，但内循环与外循环交叠发展的格局决不可能因此而改变，各国政府还是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根本宗旨，跨国公司只能在尊重所在国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开展业务，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协调各国的行动，更何况经济全球化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暴露，因此全球化决不能等同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只能是某些人的臆想蓝图。既然如此，经济全球化更不可能引导出政治一体化与文化一体化。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的确有助于造就史无前例的具有趋同性质的地球文化，但这种趋同的地球文化必须以各国文化、各种地方文化的多元化存在为前提。有差异，才有统一；有冲突，才有发展。只有多元文化的比较、碰撞与融摄，才能产生并发展全球文化。我们要像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因为多元文化是统一文化之源，有了文化源头的丰富多样，才有文化升华的灿烂辉煌。地方文化存在的价值在于独特性，正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言，只有具有鲜明的地方个性特征，才有为世所重的价值，才有保存下去的意义，因为它为世界文化界提供了历史研究的范例、现实建树的借鉴与未来发展的启示。就以徽文化而言，徽州商人从东晋起就行商四方，久而久之形成吃苦耐劳、锲而不舍、认真踏实、不务虚华的徽人性格，被喻之为“徽骆驼”，胡适先生就曾挥毫写下“努力做徽骆驼”以他勉兼自勉；徽商之所以能够崛起为中国第一商帮，与其树立群体诚信于天下有关，他们普遍尊奉四德，即货真、价实、热诚、守信；徽商久盛不衰，与其“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贾儒相助”传统大有关系，故历史上论儒商首推徽商。凡此种种文化品性与习尚岂不值得令人珍惜与研究？

其次，从文化的历史命运看，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生命周期，即必然会经历萌动、发展、鼎盛、衰退、消亡这五大阶段，只是需要特别强调文化的消亡是需要特定的“惨烈”条件的，即失去这种文化的主体一人，这种文化才会最终消亡。民族文化只有当其民族已融入它族，民族文化才会湮没，如匈奴文化；反之，哪怕这个民族星散四方，其文化仍然可能具备活力，如犹太文化、吉卜赛文化，还继续发挥维系族人的纽带作用。徽文化之类有光荣历史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只有当原著民不复存在，这种地方文化才会成为历史陈迹，否则，哪怕行政区划有变，他们的文化认同也依然强烈，如原属古徽州的婺源现已划归江西省，绩溪县划归宣城市，但他们仍以徽文化的传人自傲。徽文化现在属于衰变期，相对于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其辉煌度与影响力确实是衰退了，但衰中有变，未尝不能通过变革实现中兴。

再次，从文化的流变走向看，经济全球化必然加快文化现代化的速度，一切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文化传统，哪怕历史上再神圣、再辉煌，也必将改革或抛弃。因此地方文化需要强调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向文化传统告别是痛苦的，但只有经历这种“蝉蜕”痛苦才有新生，才有明天。徽州人多为两晋之际、唐代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两宋之际中原士民举族南徙之后裔，这种移民背景不但形成上千聚族而居的村落，而且形成持久而强大的封建宗法制文化传统，清代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描叙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人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子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家，不动一杯；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现在这种宗法制传统已丧失存在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条件，渐被百姓摒弃。当年在宗族统制下形成的徽商经营模式，以举家集资、家族经营、重用族亲、忌防外姓为特征，这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不合时

宜，凭此经营模式已难以做大做强，更遑论闯出国门，驰名天下了。今天黄山市的旅游开发，就强调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理念，彻底抛弃故步自封、小富即安、肥水不流外人田之类小农小商意识，招商于四方，合作于天下，推行现代化企业管理。

最后，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看，地方文化虽有与风土民众血肉相连的强大生命力，但如前文所述，面临时代的巨大变革，它也必然产生消逝、破碎、失效、融入现代文明之类分解，其永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顺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满足人民群众心理需求的价值。黄山市的旅游大发展，直接推动着徽文化的扬弃，加速了它融入现代文明、融入现实生活的进程，如旅游扩大了徽派建筑的影响，推动了徽菜、徽墨款砚、徽派盆景的振兴，加快了徽派木雕、石雕、砖雕、竹雕的艺术创新，这些古老的技艺都因为海内外游客的广泛需要而注入新的生命力，风格流派特色变得更为绚丽突出。文化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应立足于自由与充分的科学研究，1985年原徽州地区成立徽学研究会，1999年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首批进入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省与黄山市举办各种徽学学术讨论会30多次，其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就有8次；先后创办了《徽学通讯》和《徽学》两种不定期刊，《徽学》、《徽州文化研究》与《徽州学丛刊》等学术辑刊，这些研究组织、学术阵地与国际交流，正为徽文化的扬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说到底还是和而不同，地方文化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只能是追求文化的持续多元共存，阿尔琼·阿布杜莱与卡捷琳娜·斯泰诺在其论文《可持续多元共存和未来归属问题》中对此命题有番精辟的概括：“所以持续多元共存是指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一定数量不同文化的群体以其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彼此相关，但每一个群体都有最大的机会繁衍自己的特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创造性地进化发展。”发现与保护地方文化的独特成果，传承与发展地方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是中华文化复兴、世界文化进步题内应做之事，也是我们的历史职责。

参考文献：

- [1] 耿云志. 今日中西文化问题 (A). 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2] 顾晓鸣. 有形与无形: 文化寻踪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3] 塞缪尔·亨廷顿. 发展的目标 [A]. 罗荣渠.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 [4] 谭其骧.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 [A]. 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5] 阿尔琼·阿布杜莱, 卡捷琳娜·斯泰诺. 可持续多元共存和未来归属问题 [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张朝胜